

吳經熊與中國教會本地化

林雪碧

Contribution of John Wu to the Localization and Inculturation of the Church in China

LAM Suet-pik

[摘要] 吳經熊中年改宗天主教後，尤醉心宗教與文化之探討。他曾翻譯《聖經》；以天主教教義與中國傳統思想互相解釋印證；又曾擔任駐教廷公使，以外交要員身份參與中西文化之討論。他一直主張以基督信仰為中西文化結合之正途，鮮有提及教會本地化一詞，但是他的著作和言論確實深化了教會本地化的意涵。本文試從吳經熊的翻譯工作、對天主教教義之詮釋及對教廷之外交工作等各方面，縷析其教會活動並探討其對教會本地化之影響。

天主教與佛教均為外來宗教，但直至今天，天主教仍未能像佛教那樣被接納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這裡無疑存在一個「本地化」的問題。在教會而言，本地化是要把聖經中的信息，在中國文化中具體的表現出來，但又必須忠於教義，不能因遷就中國教徒而背棄教會的訓導，所以推行過程中必須小心謹慎，避免出現偏差。在中國教徒方面，則不僅要在中國文化中表達教會經驗，

更要使之變成靈感、方向和統一的源頭，以創新、充實中國文化，並充實教會。¹

在吳經熊的著作中，從沒有提過「本地化」；可是他卻一直從事相關的工作。他以駐教廷公使的身份，為中國與教會建立官式的交流渠道；他以學者的身份，為兩大文化體系找出融通之徑。

一·外交工作

天主教傳入中國已久，但是直至 1942 年中國與梵蒂岡才正式建交，雙方分別派遣謝壽康（1897-1973）及黎培里（Antonio Riberi, 1897-1967）為首任公使；1946 年，教廷擢升青島主教田耕莘（1890-1967）為樞機；又把中國境內所有傳教區及代牧區升格為教區，中國天主教會聖統制於此建立。

中梵建交時，吳經熊不但已領洗加入天主教，更受蔣介石之托開始翻譯聖經中的聖詠和新約全書，因此，他一直希望能到梵蒂岡去以便請教當地的聖經學者，尋找有關方面權威的解釋，蔣介石對此表示贊同，但戰時一直未得其便。² 1946 年，教廷公使之位出缺，吳經熊便得以接任其職，並稱呼自己的出使為「愛的外交」。³

¹ 鍾鳴旦著，陳寬薇譯，《本地化：談福音與文化》（台北：光啟，1993 年），頁 34，90。

² 方豪，〈吳德生先生翻譯聖經的經過〉，載《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學生，1969 年），頁 1975-6。

³ 吳經熊著，周偉馳譯，《超越東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382。

吳經熊初到教廷，晉見教宗庇護十二時呈上國書，引起了羅馬各界的注意。因為雙方的講話內容並非一般的外交虛套文章。吳經熊的頌辭，被認為是結合了非凡的學術修養和超性精神，他提到了明末利瑪竇、徐光啟等教徒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也宣示了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的一致性。而教宗的答辭亦不似外交辭令，除頌揚中國民族美德外，也特別注重其人格，稱揚他的學術道德。⁴

吳經熊說：「…我的使命不是別的，正是堅定並增進人類社會最大的屬靈力量與東方最古老文明之間的親密關係。二者的聯姻將成為上主所創造的世界的一個重大事件…陛下反覆強調博愛律法的重要性：唯有仁愛才能鞏固和平，消除仇恨，消弭嫉妒與糾紛。這也在中國引起了共鳴，因為中國人生哲學傳統教導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所以，水在舊水罐裡急切地等待著被變成酒。」

教宗則回應：「…我們把閣下視作教會的忠誠兒子，你入到公教信仰的旅程得到了但丁神曲的光照，你的思想和行為以典型的方式統一了對上主的愛和對祖國的忠誠…教廷對所有人都懷抱著同等的福佑，而不管他們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不管他們的來歷和語言，不管他們的種族和文化。」⁵

駐教廷期間，吳經熊特意拜會與中國傳教有關的修會總會長，如方濟會、道明會，與之詳談其本會在華傳教方針，鼓勵各修會

⁴ 羅光，〈吳公使經熊在羅馬之動態〉，載《益世周刊》，28卷23期（1947年），頁373。

⁵ 吳經熊著，周偉馳譯，《超越東西方》，頁382-8。

在華各盡一己之特長，通力合作，使傳教事業統一中有變化，變化中有統一。⁶

天主教教徒雖遍布世界各地，但作為一個國家，梵蒂岡教廷佔地極少，教廷又不同於一般國家的講求軍事或經濟利益，她只關心教務工作，而當時大戰已告結束，教廷與中國之關係亦佳，因此駐教廷公使之工作算不上艱鉅。吳經熊遂把握機會搜集有關聖經之材料以作譯經之用，又四出演講介紹中華文化與天主教會之關係。⁷ 據使館顧問羅光（1911-2005）所記，吳經熊大半時間都用作修訂聖經翻譯，而把使館的事務都交託給他。⁸

吳經熊不管使館內日常瑣事，注意的是中梵外交的大原則，以及足以影響雙方關係的國際形勢。他曾上書外交部，建議把駐教廷使節由公使升格為大使，他的建議並非為自己升職鋪路。他認為教會既已在華建立聖統制，又擢升中國主教為樞機，升格使節乃表達對教廷的友善回應，鞏固彼此關係；此外，在外交場合，公使排列於大使之後，則中國雖為聯合國創辦五強之一，其亦不能廁身外交團之前列，有影響中國國際地位之嫌。其實早在 1945 年，方豪已上書蔣介石作出有關提議。⁹ 但是外交部以中國教務為中國內政，對教廷「過份」友好則容易惹來干涉內政；而教廷

⁶ 羅光，〈吳公使經熊在羅馬之動態〉，載《益世周刊》，28 卷 23 期（1947 年），頁 374。

⁷ 如 1947 於意大利亞西西城主講「中華之聖母敬禮」；事見羅光，〈吳經熊公使在海外〉，載《益世周刊》，29 卷 17 期（1947 年），頁 268。又如 1948 於額我略大學主講「*Del Confucianismo al Catolicismo*」；John C. H. Wu, *Del Confucianismo al Catolicismo* (Berriz, Vizcaya: Angeles de las Misiones, 1948)

⁸ 羅光，〈使館生活〉，載《牧廬文集》（台北：先知出版社，1972 年），頁 314。

⁹ 〈抄南京教區司鐸、復旦大學教授方豪對梵蒂岡教廷外交事宜條陳〉，1945.4.3，載陳方中，吳俊德主編，《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彙編》（台北：輔大天主教史料中心，2002 年），頁 98-99。

對中國而言，其重要性遠比不上英美等大國，是故通使可以，卻不必派遣大使。¹⁰

吳經熊重提升格舊事，南京總主教于斌得聞此事，即致函蔣介石加以游說，並推薦吳氏擔任此職。¹¹ 蔣介石亦順應要求發函外交部商討有關事宜，外交部面對上級的壓力，雖然對事件仍有所保留，但是立場亦有所鬆動。¹² 可是，事件進行未幾，中國局勢急變，蔣介石於 1949 年 1 月下野，升格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這可說是中國天主教徒與外交部的一場角力，作為教徒，吳經熊當然支持使節升格。而當時外交部反對是認為教廷只屬蕞爾小國，不必太過禮待；然而，今天中華民國在歐洲只有教廷一個邦交國，成為其在歐洲之重要跳板，對此珍而重之，鞏固雙方關係唯恐不及，這卻是外交部當日所意想不到的。

吳經熊於 1949 年辭去駐教廷公使職務，遠赴美國從事學術研究。1993 年，吳經熊已去世七年，他的二兒子吳祖禹（1920-2006）接任駐教廷大使，子承父業，可說是延續了吳經熊對梵蒂岡的外交工作。

二·編譯工作

¹⁰ 〈外交部官員對方豪有關梵蒂岡教廷外交事宜條陳之意見〉，1945.4.3，載陳方中，吳俊德主編，《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彙編》，頁 100-101。

¹¹ 〈于斌致蔣中正電文〉，1948.12.16，台北輔仁大學校史室藏。

¹² 〈外交部歐洲司簽呈〉，1948.12.28，載陳方中，吳俊德主編，《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彙編》，頁 139-140。

語言文字是人與人之間互相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表達；天主教會要植根中國，中文信仰書籍是缺不可少的。然而，此類書籍卻偏偏異常缺乏，對傳播信仰造成障礙；而且提高教徒素質、深化信仰，亦必須書刊的輔助。吳經熊在此範疇花了很多心血，為天主教會的文宣事業作了不少貢獻。

有關吳經熊的翻譯工作，最為人熟知的恐怕是聖詠和新約聖經。天主教會的一切教義都由聖經引申而來；作為一個教徒，也就必然很重視它。但是，即使由明末利瑪竇算起，天主教傳行中國三百多年，仍未把整部聖經翻譯出來。¹³ 基督教則於十九世紀初已由第一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聖經全書。兩者相較，天主教顯然遜色得多。1938年，吳經熊旅居香港，閒來翻譯了幾首聖詠；其後把譯作送給同在香港暫居的宋靄齡，而宋氏又將之轉送給蔣介石夫婦。他的譯文受到蔣介石的賞識，蔣氏更正式委任他翻譯聖詠和新約。

聖經原文為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吳經熊對兩種語文都不懂，也沒有受過神學或聖經學的訓練，因此他在擔任此項翻譯工作時頗受質疑。但是，他認為中譯聖經，最主要的便是中文；而歷來學者對聖經原文的考證非常豐富，又有多個英、法譯本，他只需參考並整理前人研究所得，譯成中文即可；話雖如此，最後，他還是修習了翻譯所需之語文。¹⁴ 他為譯經費盡精神，每譯一稿，即交蔣介石點校，前後共三次之多。他首先翻譯聖詠，然而他沒

¹³ 天主教傳教士曾嘗試翻譯聖經，但是都只翻譯了一部份，有些更沒有出版，包括賀清泰（Louis De Poirot）於1800年翻譯大部份舊約及全本新約。王多默於1875至1883年間譯出新約四福音及宗徒大事錄等。事見思高聖經學會編，《聖經簡介》（香港：思高，1981年），頁123-4。而較為流行的則有蕭靜山譯，《新經全集》（獻縣：耶穌會，1930年）及李山甫等譯，《新經全書》（天津：崇德堂，1949年）。

¹⁴ 方豪，〈吳德生先生翻譯聖經的經過〉，載《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976。

有按聖詠各篇的次序翻譯，只按自己的情緒來譯相應的篇章，每天翻譯一首。出版時注明為「初稿」，表示日後尚會作出修改。其後他乘著出使梵蒂岡之便，多方走訪聖經專家，又得羅光及當時在比利時修道的陸徵祥（1872-1949）之助，譯成新約。¹⁵

吳譯之前，天主教中譯聖經很少受到注意，但是吳經熊譯本卻引起了哄動，尤其《聖詠譯義初稿》出版一個月即刊印至三版之多，合共二萬八千本，相較同期出版的另一譯本，由雷永明（Gabriele Maria Allegra, 1907-1976）等聖經學者翻譯的《聖詠集》（北平：方濟堂，1946）僅刊印二千本，可見吳譯之備受歡迎。

16

《新經全集》出版時（1949）正值時局不穩，可能因此不及《聖詠譯義初稿》暢銷。不過，無論《聖詠譯義初稿》或《新經全集》，都不是天主教禮儀常用之譯本，一則因為吳經熊沒有把全本聖經譯成，二則是兩書皆為「譯義」，譯文字句有時與原文頗有出入，例如聖詠一三一一首與原文相去甚遠，又或者為使〈瑪竇福音〉所載「天主經」文意更完整而添加了一句，今與通行的「思高本」相較即可知曉：

聖詠 131 首

「我心如小鳥，毛羽未全豐。不作高飛想，依依幽谷中。我心如赤子，乳臭未曾乾，慈母懷中睡，安恬凝一團。勗哉吾義塞，飲水輒思源，世世承流澤，莫忘雨露恩。」（吳譯）

¹⁵ 羅光，〈樂天知命道貫中西：記吳經熊公使〉，載《牧廬文集》，頁 47-48。

¹⁶ 〈出版消息〉，載《上智編譯館館刊》第 2 卷 2 期（1946 年），頁 173。

「上主，我的心靈不知驕傲蠻橫，我的眼目不知高視逞能；偉大驚人的事，我不想幹，超過能力的事，我不想辦。我只願我的心靈，得享平靜與安寧；就像斷乳的幼兒，在他母親的懷抱中，我願我的心靈在我內，與那幼兒相同。以色列！請仰賴上主，從現今一直到永久。」（思高本）

瑪竇福音 6:9-13

「在天我儕父，祝爾聖名芳。願爾國臨格，俾爾德化昌；爾旨行人世，一如在帝鄉。我儕今爾祈，賜我以日糧；鑿我恕人過，吾過仰包荒；免我墮誘惑，拯我出咎殃。」（吳譯）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如在天上一樣！我們的日用糧，求你今天賜給我們；寬免我們的罪債，如同我們也寬免得罪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思高本）

如是，吳譯「達」與「雅」皆備，卻難言之為「信」。但整體而言，吳譯古雅而不晦澀，尤其聖詠譯文採用中國古詩體裁，濃厚的中國文化氣色躍然紙上。

此外，又鑒於中文禮儀書之奇缺，解釋禮儀聖祭的更是鳳毛麟角，教徒經常參與彌撒，實則對當中意義認識不多，有礙信仰發展；於是，吳經熊著手翻譯由美國史德曼所編的《我的主日彌

撒經書》。¹⁷ 此書載有彌撒經文及其解釋，目的是讓教徒能與主禮司鐸一同誦唸經文，並領略彌撒禮儀的奧義。此書譯本因戰事而延期出版，不過，即使拖延了幾年，出版之時，仍為當時少有的中文禮儀專書，因此頗受歡迎，四個月內已經再版應市。¹⁸ 事實上，在 1960 年代天主教禮儀改革前，本書一直為中國教會所重用，對華人信徒，以至推動禮儀本地化，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梵二之後，天主教會積極落實本地化及革新禮儀，吳經熊亦重新翻譯彌撒中的聖經選讀。當時，由於通用的思高聖經譯本之行文用字似專為閱讀而有，不便誦讀。香港主教徐誠斌遂於 1970 年委託吳氏擔任重譯工作。重譯以思高本及耶路撒冷本為藍本，用字務求淺明，易於誦讀，此與《新經全集》及《聖詠譯義》有所不同。¹⁹ 全書分為八小冊出版，計有：《將臨期禮儀》、《聖誕期禮儀》、《四旬期聖祭禮儀》、《聖週禮儀》、《復活期禮儀》及三冊《主日聖祭禮儀》。他重譯聖經選讀，受了不少壓力，據稱方濟會對其譯本抨擊不遺餘力，若非徐誠斌大力支持，吳譯恐怕難以面世。²⁰ 而書中未有著名為他執筆重譯，故知之者不多。

翻譯聖經和禮儀書外，吳經熊亦非常重視知識的傳授，他認為信仰若沒有其知識基礎，便不足以解釋信仰之所以為信仰。故此，探討知識成為獲得並保障信仰的一種必要條件；信仰將因知識的累積而更為充實。於是聯同香港公教真理學會搜羅西方有關

¹⁷ J. Steadman 編，吳經熊譯，《我的主日彌撒經書》[*My Sunday Missal*]（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46 年）。

¹⁸ N. Maestrini, *My Twenty Years with the Chinese* (New Jersey: Magnificat Press, 1990 年), pp. 179.

¹⁹ 〈香港教區禮儀新猶：敦請吳經熊重譯彌撒中聖經選讀〉，載《公教報》（1970 年 2 月 6 日）。

²⁰ 徐誠斌致書方豪，1970 年 4 月 9 日，方豪輯註，《徐誠斌主教殘簡》（台南：聞道，1977 年），頁 89。

基督教思想生活的名著，以翻譯成中文；並洽商上海商務印書館負責出版發行，以圖利用其龐大的發行網絡，如此，一方面照顧教內人士閱讀之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把教會思想介紹給教外人士，希望藉此消除外界對教會的誤解；並且讓讀者對以基督信仰為中心的西方文明有更深的認識，進而與中國的固有思想生活，發生交互融冶的作用，為中國文化加添一股新血。²¹ 多年來，他們邀請各方人士翻譯了《進步與宗教》、《哲學概論》等多部作品。²² 部份譯作已經付梓。可惜，受戰爭影響，所有計劃被迫告吹；直至戰事結束，才把少數仍然保存完好的譯稿陸續出版，結集為《甘露叢書》，為國人介紹以基督教為中心的西方文明，加添助力。²³

三·闡釋教義

耶穌說：「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即使天地過去了，一撇或一劃也決不會從法律上過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誰若廢除這些誠命中最小的一條，也這樣教訓人，在天國裡，他將稱為最小的；但誰若實行，也這樣教訓人，這人在天國裡將稱為大的。」（瑪竇福音 5:17-19）作為一個法學家，吳經熊認為耶穌此言是指舊約中的道德律，而這些道德律，在西方而言就是「自然法」，在中國則是儒家的道德學說。²⁴

²¹ 吳經熊，〈甘露叢書總序〉，載《上智編譯館館刊》第2卷3期（1947.5），頁222-3。

²² C. Dawson. 著，柳明譯，《進步與宗教》[*Progress and Religion: an Historical Enquiry*]（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J. Maritain 著，戴明我譯，《哲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

²³ 吳經熊，〈甘露叢書總序〉，載《上智編譯館館刊》，第2卷3期（1947.5），頁222。

²⁴ 吳經熊，〈文化傳教的展望〉，未刊稿，頁1。

吳經熊修訂聖多瑪斯的自然法思想，按法律的來源和性質把法律分成三類：永恆法、自然法和人定法。永恆法來自天主，唯天主知之。天主是宇宙的創造者，所有受造物必須服從祂，永恆法就是天主的意志的體現。人是受造物，本來無法理解天主的意志，但是受到天主的眷顧而賦予以理性，藉此天賦理性而成為永恆法的參與者，從而產生一種自然法則以指導自己從事適當的行為和目的，即為自然法。人定法則為統治者為公眾利益而制訂之理性命令，例如民法、國家法等，是自然法原則之具體實踐。儘管各人對自然法的理解不一，但是其不變的核心原則是「為善避惡」，其他一切的法則都是據此演變出來的；但凡與此有所抵觸之法律即為不合正義的法律，不具法律之性質，可以不加服從。²⁵

這三者有著內在一貫性的聯系，吳經熊以一棵大樹比喻三者的關係：永恆法是深埋地下的樹根，自然法是主幹，而人定法的各種不同制度則是枝葉。因此，自然法就成為永恆法與人定法的溝通橋樑，也就是天主的意志和人的行為的溝通之途。²⁶

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訓誨，乃是「為善避惡」的延伸。而《中庸》裡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句，正與自然法思想相合；追尋美善的天命相當於永恆法，根植人心而成為行為的法則，即是道也就是自然法，人定的教化則是順應道的指引，人據此而在塵世生活回應天命，達致永福。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盡其性，所以事天也。」更是

²⁵ 傅偉勳，《西洋哲學史》，12版（台北：三民書局，1990年），頁207-209。

²⁶ 吳經熊，〈自然法哲學的比較研究〉，載《內心悅樂之源泉》，5版（台北：東大圖書，1989年），頁183。

對《中庸》的最佳詮釋，如此，天命、人性和教化三者形成一個體系，這與自然法為人類理性所認識的原則，並處於不斷發展的情形一致。可見，儒家學說並非毫無形而上基礎的人文主義。²⁷ 由於天主是眾善之根源，一切「諸惡莫作」或「眾善奉行」都是回應天主召叫；所以，孔子的道德教訓正好體現了天主的意旨。²⁸

吳經熊一直提醒基督徒：天主是基督徒的創造者，也是非基督徒的創造者。中國文化，以至其他各個民族文化中所有美善的東西都是出自天主這「活源頭」，不應該受到排斥摒棄。他更認為基督信仰肇始於中東地區，那是天主的巧妙安排。因為那是既不在東也不在西的地方；換言之，即是西方人認為是東，東方人認為是西。而在時間上，耶穌降生前，東西方哲人輩出，各自在自己的家鄉，盡己之力揭示人生真諦。他認為孔子、孟子和其他古聖先賢都是先知，都是為基督預備道路的先鋒。²⁹

吳經熊又談到道家的「道」，是指不可用言詞來表達的最終實在，它是自然的源頭，也是一切事物和美德的根源。道既超越萬有，但也內存於萬有，人若能拋開外在的束縛，把眼睛轉而望向自己的內心深處，培養內在的靈性，就能在自己裡面找到它；當人安心接受生命中的各種遭遇，便能與道合一，「自然的寶藏、日月星辰全都屬於你，整個宇宙也都屬於你。」³⁰ 道家絕聖棄知、清靜無為的主張，往往被視為消極被動。吳經熊則指出這並非鼓勵人一動不動；得道者的一生中可能擁有各種成就，但是其內心明瞭自己從屬於「道」，能有所成並非自己的功勞，而是「道」在他內運行的結果。最後，得道者雖稱為聖人，但是，他會認識

²⁷ 吳經熊，〈孔子思想與中華文化〉，載《內心悅樂之源泉》，5版，頁53-3。

²⁸ 吳經熊，〈文化傳教的展望〉，頁3。

²⁹ 吳經熊，〈甘露叢書總序〉，載《上智編譯館館刊》，第2卷3期（1947.5），頁222-3。又見 John C. H. Wu, "Christianity, the Only Synthesis Really Possibl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Chinese Human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Paul K. T. Sih. (ed.).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58.

³⁰ 吳經熊著，朱秉義譯，《中國哲學之悅樂精神》（台北：上智，1999年），頁21。

到自己對道根本不瞭解，因為天道無限，遠遠超乎人的理解能力。這樣，聖人就變成一個小孩，像依賴母親一樣完全地依賴於天。³¹ 顯而易見，這正正是耶穌對門徒的教訓；保祿宗徒也說過：「我說這話，並不是由於貧乏，因為我已學會了，在所處的環境中常常知足。我也知道受窮，也知道享受；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或飽飫、或饑餓、或富裕、或貧乏，我都得了秘訣。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理伯人書 4:11-13）

至於佛教，吳經熊最景仰佛祖釋伽牟尼因尋道、普渡眾生而捨棄尊位的人格，其屈尊就卑可說是耶穌的預像。³² 佛的教訓很容易理解，就是中庸之道；四聖諦和八正道等修行方法，也無非叫人培養正確的觀念和行為，不偏執、不迷戀。有時，禪師與門徒的對答，好像故弄玄虛，叫人莫名其妙，但是此非純粹的思辯方式，而是一種幫助心性開悟的法門，目的是讓人打破一面的執著，在不同的偏見中行走，以徹悟本體根源，達至「明心見性」。

33

明心見性不在遙遠大道，而在日常生活中，從平平無奇的經驗中體會永恆的真理，掃地、煮菜、吃飯都蘊含妙諦。禪師很重視頓悟，那是在剎那間，瞥見事物之本性，忘懷一切憂懼，看似居住在同一世界，實則生活在新天新地裡，明心即能見性，見性即能成佛。³⁴ 吳經熊認為「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一語最能道出禪的境界：一時之風月，驀地闖入永恆；儘管很快又會歸於平靜，但是剎那已是永恆。整個禪的意義，無非想要喚起人對生生不息

³¹ 吳經熊，〈莊子的智慧〉，載《哲學與文化》，2版（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頁25。又見吳經熊著；周偉馳譯，《超越東西方》，頁191。

³² 吳經熊著，周偉馳譯，《超越東西方》，頁197。

³³ 吳怡，《中國哲學發展史》，3版（台北：三民書局，1989年），頁405-406。

³⁴ 郭果七，《吳經熊：中國人亦基督徒》（台北：光啟，2006年），頁160。

與時空交融的覺悟；當一個人自性俱足時，最偶然的機緣，都能使他開悟。³⁵

禪與道家都把「超越」與「內在」融冶一爐。但是吳經熊認為禪比道家更進一步，因為禪能超脫於超脫而回到人間，雖則希望到達彼岸，卻停留在此岸踏實生活。這種對彼岸的渴求，就是銘刻人心的上主之國的另一個名稱和預影。³⁶

基督本為天主子，但祂降生成人，在天主與人之間、在無限與有限之間架設起橋樑，讓人能超越現世的限制回歸到無限的天主之懷。基督為人類訂立了模範，祂在世生活時，愛護人類兄弟，盡力教化世人，但同時祂明白地指出祂最終的歸宿不在現世而在天上，這種生活態度，融合了儒家之積極進取，與及道家佛家意欲擺脫生命之束縛，對來生之追求。吳經熊認為唯有基督如此的既是神又是人，才能兼具無限與有限的特性。祂使人類明瞭自己可以積極於塵世生活而隸屬於天主。

吳經熊以基督信仰蘊含了儒道佛的精義，對他而言，最能具體展現儒道佛特質的基督徒，非聖女小德蘭(St. Theresa of Lisieux, 1873-1897)莫屬。她毫無保留地順應天命，但卻不是消極面對，而是一如孔子般熱愛他人，對後學循循善誘。她有滿腔熱血，為拯救人靈甘願赴湯蹈火，此復有佛家慈悲捨身的精神。而她的思考方式卻又似道家的機智灑脫，例如她認為最偉大的莫如赤子，痛苦就是幸福，活脫就是老子似非而是的玄思妙想。

四·結論

³⁵ 吳經熊著，朱秉義譯，《中國哲學之悅樂精神》，頁 63。

³⁶ 吳經熊著，周偉馳譯，《超越東西方》，頁 207。

吳經熊任職駐教廷公使期間，大力推動使館升格事宜，以鞏固中梵關係；雖然未能取得成功，但他為此所付出的努力亦不容忽視。

在其任內，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善用自己的學者身份，積極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文化，向人呈現中國固有文化中優越深湛的一面。他走的是「學術傳教」路線，偏重於文化工作，他希望以中國人的文字和思想去表達教義，從而深化教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讓中國人更能認識教會，為中國教會營造合適的生長環境。於是他翻譯彌撒用書和聖經，讓中國教徒可以更投入禮儀聖祭，而聖經譯文更是優美可讀。他說要為基督做一件中式長袍，這無疑是成功的，但是當時已經有多個新約譯本，若他能將時間精神用在舊約上，則相信會對聖經整體的翻譯及研究工作更有助益。

吳經熊經常把儒道佛及基督信仰互相引證，似是信手拈來，實則他早已對兩者有深切的體會，所以每有獨特創見。他把儒家思想與自然法、與天主的旨意連結起來，又把道家與禪學的神秘主義，注入基督信仰的靈修中，將之豐富起來。

吳經熊在教會本地化的歷程中沒有做過什麼扭轉乾坤的大事，卻從教會和中國傳統思想的根本處著手，一次又一次的向教會人士證明，儒道佛三家思想並非反基督的異端邪說，一次又一次的向中國人強調基督信仰早已潛藏在自己的傳統當中。

回顧過去，從二十世紀初的「夫至大」通諭到六十年代的梵二會議，本地化的傳教路線已經受到教會官方的肯定；可惜時至今日，中國教會本地化，似有還無。很多人只斟酌教堂建築外貌

是否帶有中國特色，彌撒中用的是檀香或乳香，獻唱歌詠時是否用上二胡古箏。外在的行為，固然可以反映其背後的思想理念；但是中國教徒要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人，才是中國教會本地化的重要元素。他們必須認識並愛護自己的固有文化，對自己的傳統懷有一份溫情與敬意。吳經熊終其一生都在努力修築做個真正的中國人和真正的基督徒之路徑，讓教會可以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的土壤。

[ABSTRACT] After John Wu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his life was full of faith and devoted to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tudies. For example, he translated some parts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He attempted to combine Chinese culture with Christian doctrine and explained Christian doctrine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en he was the R.O.C. Minister to the Holy See, he introduced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presented his views on cross-cultural studies to foreigners. He believed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only bridge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e never mentioned "localiz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but his works really deepened the meaning of i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laborate on his groundbreaking work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